

• 革命斗争回忆录 •

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

龙 飞 虎 著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翻印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革命斗争回忆录。作者龙飞虎少将，从1936年就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一直工作了十多年。他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事变、长沙大火、毛主席在重庆、1946年政协会议、较场口血案等事件，概括而有力地阐明我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并且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周副主席深入蒋管区，奔走斡旋，艰苦工作，以及他简朴的生活与和蔼可亲的高尚风格。

同时，在这篇回忆录里，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面目。全篇文字干净朴素、生动。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目 录

西安之行·····	1
长沙大火·····	7
曾家岩·····	12
新华日报的斗争·····	10
毛主席在重庆·····	27
李少石同志遇难·····	26
政协会议·····	28
较场口血案·····	31
乌云密布·····	35
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41

西 安 之 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住了蒋介石，爆发了“双十二”事变。那时，我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听到这件事情，非常高兴。提起蒋介石，我们真恨之入骨。他“剿共”剿了上十年，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这下给捉住了，真是大快人心！

12月14日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校部突然要我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人马上到校部去。

中午赶到了部校，付教育长刘亚楼听说我们来了，亲自赶到室外来迎接。我们一放下背包，就问他要派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他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叫我们先到军服工厂量衣服；当天，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身灰色的国民党式的棉军装。晚上刘亚楼请我们吃饭，吃饭时，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小鬼，你们有福气，要坐上飞机啦！”“我们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想问个究竟。他却说：“具体任务，到李克农同志那儿去问。”

我们四个人兴冲冲地跑到李克农同志哪里，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说：“周副主席要去西安，派你们去当卫士，愿意吗？”我们一听是保卫周付主席，打心里高兴，哪有不愿意的呢？李克农同志笑了笑，又说：“你们都是在红旗下飘大的，又是保卫干部，党信任你们，才把保卫副主席的任务交给你们。”接着他教了我们一套有关国民党军队的

礼节和待人接物的办法。最后他说：“任务艰巨啊，小鬼！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出发。”我们向他敬了礼，连蹦带跳地跑了出来。

回到宿营地，已经很迟了，可是四个人都睡不着觉，躺在坑上望着窑顶，一想到要去保卫周副主席，恨不得马上到付主席身边。这一夜的时间显得特别长，老不见天亮，我不时啐口痰，怨起老天来。

15日清晨，天刚刚亮，我们一翻身就跳下坑来，飞快地去找周副主席。一跨出门，啊！好大的雪，黄土高原变成了白银世界，大雪纷飞，西北风象刀子一样割人。天气虽然冷得滴水成冰，但是我们感到心里非常暖和，一点也不冷。冒着风雪，跑啊，跳啊，终于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也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军装，蓄着又长又黑的大胡子，两只眼睛炯炯发光。我刚见到他时，确实有些畏缩，不敢和他多说话。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二十几个人骑上从骑兵团挑选来的二十几匹蒙古马，每个警卫员都佩带一支二十响手枪，雄赳赳地显得很威武。冒着大风，踏着白雪，我们向延安进发，要到延安转乘飞机去西安。副主席骑的是一匹枣红色的大马，他在马上不时地侧转头察看路两边，又和靠近他的同志谈话。一直走到天黑，才在安寨附近的一个庄子里住下来。这个庄子只有十八户人家和一些破窑洞。晚上我们就挤在两个窑洞里睡觉，副主席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他一直忙着招呼别人睡觉，我们向他说：“你骑了一天马，先去休息休息吧！”他不肯，非要别人睡了他再睡。这天晚上，副主席知道我们是由红军大学调来的，就问起学校里的情况来，我们一一的告诉了他。他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

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我说知道一些，就讲给他听。他听了后鼓励我说：“好嘛！以后还要努力学习。”我们点了点头，感到特别亲切，早上那种畏惧心理一下子都消逝了。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驻地，这一天天气特别冷，北风呼呼，砭人肌骨，周副主席身上只加了一件棉大衣，我们都担心他吃不消，然而他一路上有说有笑，好象不感到冷。下午，我们赶到了延安。这时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土顽军队占着，国民党的“县太爷”黄仁坤听说我们来了，慌里慌张地命令他的保安队，不准我们进城。我们只好绕到南家坪，又找到了两个破窑洞住下来。

天蒙蒙亮，我们又上路了，因为国民党不让进城，只好从枣园插到杜甫川，走另一条道到飞机场去。这是一条小道，又窄又滑，很少有人走，骑马就更难通行，大家只好下马步行，我们怕副主席滑倒，走到他身边想挽着他走，付主席一看，笑了起来，并说：“嗨！你们真把我当成老人了，我可不比你们这些小青年差劲，不信来比比看！”说着，他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轻捷地走起来。

走到七里铺，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飞机声，我们就停下脚步侧着耳朵倾听，声音渐渐大，果然飞机来了，不一会，就在延安城上空盘旋起来。为了赶乘飞机，周副主席就拿出一张名片，叫徐参谋到延安城里去见国民党的县长，让我们进城抄近路去飞机场。

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是个老土顽，徐参谋说烂了舌头，他还是不让我们进城；徐参谋脸气得煞白地跑了回来，我们只好从城外转到延安东门，傍着蜿蜒的延河往飞机场走去。

刚刚进入机场，张学良派来接我们去西安的一架波音机正好停下来。这是张学良的专机，坐不下20多个人，有些同志被留下了，我和杨家堡同志就挤在行李舱里。下午一点钟，飞机从延安起飞了。当时正下着大雪，鹅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天上地下白茫茫的一片。

大约一小时之后，飞机在西安南门机场降落了，张学良派了人来迎接我们。我们下飞机后就坐上汽车进城，这时天已昏暗下来，沿街의商店大部分关了门，路上行人很少，到处都是荷枪的士兵，空气很紧张，好象大战临头似的。后来才知道，当时的确是大战临头了，亲日分子何应钦指挥两路大军向西安夹击，并企图派空军轰炸西安，妄想用武力压下人民的抗日要求。

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为了不惊动人，进城后我们先在东门一个名叫王铁匠的家里休息。因为快要同张学良等会见了，有位同志对副主席说：“请把胡子修一下吧！”付主席不仅接受他的意见，还接着说：“干脆剃了吧。”当时红军生活非常艰苦，连刮胡刀都没有，王铁匠家里也没有剃刀，副主席说：“弄把剪刀就行了。”于是找来了一把大剪刀，副主席就对着镜子剪起来，剩下的胡楂长短不齐，可付主席倒挺满意。后来，张学良见到了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问：“你的胡子呢？”副主席说：“剪掉了。”张学良还婉惜地说：“唉，这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

在王铁匠家里休息了一会，我们便搬进张学良公馆。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副主席和我们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馆里。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就设宴招待我们，是中餐西吃，张、杨两位将军亲自

为我们分菜。

周副主席到西安后就忙碌起来，每天出去很早，回来很晚。那几天，西安的形势也确实紧张，东北军和西北的官兵气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副主席整天不是和杨虎城、张学良谈话，就是和蒋介石谈话，还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我那时对西安错综复杂的局势虽然知道一些，但是不很理解，副主席有时就给我们讲，并且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讲给我们听。现在回忆起来，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眼光远大。当时要是把蒋介石杀了，不仅不能解决一致抗日问题，反而会引起国内的混战，日寇就会乘机并吞中国。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于周副主席的斡旋奔走，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了，当天上午乘着一架银色的双引擎飞机离开了西安。

此后，周副主席还住在西安，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才和博古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在周副主席乘张学良飞机飞西安的当天，延安城就被红军解放了。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迁来，这里成为中国的民主圣地。周副主席回到延安后，仍继续为祖国的生存而奔走，经常来往于西安、南京等地。

延安南边约六十里的地方，有座劳山，是黄龙山脉的一个分支。劳山虽不怎么高，但满山都是原始森林，阴郁郁的。在这座山上盘踞着一股国民党的政治土匪，有三百多人，这股土匪经常袭击解放区和红军，抢劫财物，残杀百姓。

1937年5、6月间，周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去，和国民

党谈判改编红军问题。那时红军没有小汽车，只有几辆旧的大卡车，副主席就乘大卡车去西安。那天，他坐在驾驶室里，车斗里坐着两个警卫班。早上，车子从延安出发了。谁知道这一行动给劳山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知道了，他们就设下毒计，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里伏击付主席。

这天大风卷起漫天黄沙，遮住了太阳，卡车沿着山路，费力地向上爬，缓缓地穿过阴暗的原始森林，进入谷地，再向上爬。正走在两个坡之间的一段平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袭击。敌人凭着周围山头的工事，以密集的火力交叉射击卡车，一开火，司机的腿就被打断了，汽车靠着路旁停下来。车上的战士马上向敌人还击，虽然敌众我寡，战士们仍然英勇抵抗。这时，副主席疾速地拉开门，跳出驾驶室，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沿着一条小山沟，徒步走了几里山道，到了三十里铺。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口气跑到劳山，但赶到那里时，敌人已逃跑了。

在国民党预先安排的阴谋事件里，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跟随副主席多年的陈有才参谋就是其中之一。据战士说，陈参谋负重伤后，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副主席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付主席，便审问起来。陈参谋不仅不回答他们，而且愤怒地斥责他们的不明大义和卑鄙无耻。敌人老羞成怒，就利用刺刀把他刺死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无耻，从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正当我们共产党和周副主席为祖国的生存和统一，为了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侵略而奔波的时候，他们却使用了毒辣手段，制造了血腥的谋杀案件。同时，这也充分看出蒋介石忘恩负义的流氓咀脸，我们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不记旧恨，千方

百计地劝说张学良把他放了，让他活着回到南京，而蒋介石却反过来要置周副主席于死地。这是多么阴险、毒辣和卑鄙啊！

长沙大火

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和华东的大块土地后，又窥视武汉。当时国民党故作姿态，演了一场“保卫大武汉”的喜剧。可是好戏不长，没有多久，就从武汉夹起尾巴溜走了。一场喜剧变成了丑剧。

日本鬼子占了武汉，又沿着粤汉铁路进攻岳阳，企图渡过汨罗江，进逼长沙。

长沙有我们十八集团军驻湘办事处，地点在寿星街。周副主席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就住在这里。办事处是二层楼房，副主席住在楼上，因为他整天里忙工作，所以楼上的电灯总是彻夜亮着的。我们几次向周副主席提意见，请他注意身体，早些休息，他每次都答应得很好，可是到半夜去看时，楼上的电灯还是亮着。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向洞庭湖进逼。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向四川、广西等地逃窜，可是周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和随员们还留在长沙，处理许多重要公务。在那危急、混乱的时刻，全国人民都注视着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周副主席未走，老百姓的心里也就稳定。因此，在国民党的每一次撤退中，副主席总是走在最后面。太原撤退是这样，武汉撤退时

也是这样。

10月13日，长沙城里更混乱了，谣言纷传，人心惶惶。当天，副主席曾叫邱南章同志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询问有关洞庭湖的战况，国民党当局答复说：“敌人还在洞庭湖，一切平安。”周副主席就放心了，继续伏案办公。

夜幕徐徐挂下，长沙城也渐渐睡着了，一切都很平静。到了半夜，突然人声沸腾起来，凄厉的哭叫声和恐怖的嘶喊声混成一片。办事处的同志一个个被惊醒，跳下床就往外跑，跑到屋外一看，啊！到处都是浓烟烈火，天空给映得通红通红。邱南章他们以为是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了，可是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又以为日本鬼子攻进了长沙，可是没有听到炮声和枪声。于是跑到大门口去看，只见满街都是惊慌逃跑的人，男的女的，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恐怖地哭着、叫着、拥挤着，跌跌撞撞，到处乱窜。有些人手上拿的东西失掉了，也没有发觉，只顾逃命。有些人踉跄倒在地上，人流随着践踏过去。眼前这一片凄惨的景象把他们怔住了，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情，就喊住了一位中年人，要问个究竟。这人一看他们还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便惊奇地说：“军队放火烧城，你们还不快跑，在这里等死！”他们一听是国民党放火烧城了，飞快地跑回屋子里，把文件收拾起来。这时有个国民党士兵，手里拿着引火的汽油和马灯，走到办事处大门口，一声不响地就把房子燃着了。邱南章等同志上前阻止，他们瞪着两只狗眼大着嗓子说：“你们管不着，这是上头的命令！”说着，就在屋檐下放起火来。这时邱南章同志便急忙跑去报告副主席，一看副主席住的房间里还是灯火通亮，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仍安静地坐在案首，聚精会神地写着什

么。他心里急得不得了，拉住周副主席，急促地说：“快！快走！”副主席一看邱南章那付紧张的样子，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又是日本鬼子打来了，他平缓地说：“日本人还远得很嘛！”这时，火已经蔓延到院子里来了，邱南章就领着周付主席、叶剑英同志和随行人员向大门走去，但是，大门口已被猛烈的火焰封住了，于是他就领着周付主席等从屋侧的火里冲了出来。走到街上回头一看，大火已经把二楼吞没了。

到了街上，邱南章去找副主席的小汽车，连影子也没有找到，原来司机看到满城火起，怕车子开不出去，就把汽车先开出长沙城了。汽车没有找到，他们只好徒步走起来。街上到处是火，不能通行，就向湘江边走去。走到江边，只见黑黝黝的一片，江岸上，沙滩上拥挤着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到处是啼哭和叫喊声，为了让老百姓走干的沙滩，周副主席就在湿的沙滩步行，一步一陷地向城外走去。走到城外，副主席又回过头来，眺望城里，只见长沙城上升起数不清的火头，火更大更猛了。出了城，邱南章的心情稍安定了，就把国民党下令焚烧长沙的事情向副主席讲了。副主席一向是非常开朗愉快、心胸广阔的，这次却非常愤慨，他又转过身去，长久地凝视着燃烧中的长沙，脸上流露出怒不可遏的神情。

国民党焚烧长沙是挂着“敌寇将至，焦土抗战”的招牌，但是日本鬼子还在洞庭湖一带，离长沙远得很。火烧长沙前，国民党要人都已先后离开长沙，不是去重庆，便是去衡阳，就是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等没有走。国民党军队半夜三更满城放火，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对周副主席按理应该通知撤退，可是也没有给一点信息。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是何

等毒辣啊！

国民党放的这把火烧了三天三夜，一座美丽宏伟的长沙城烧掉了十分之九，成了破烂不堪的废圩，更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和伤兵葬身火窟。这件事情震动了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严办纵火罪魁。国民党害怕人民追究下去，把阴谋完全暴露，蒋介石就找了三个替死鬼，把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公安局局长文重孚枪毙了，以为这样就可以一手蔽日了。

周副主席走过长长的湘江沙滩，转到长衡公路上，司机已在公路边等待了，他们就坐上汽车向衡阳开去。这时天已经亮了。

第二天下午到了湘潭，在下司驿等待过渡。渡河的人啊，马啊，车啊，多得不得了，汽车一部接一部，象一条无尾的长龙，一时渡不过去，就在渡口等待。

国民党火烧长沙的时候，我因公到源陵，听到这件事情，心里很急，担心副主席遭到反动派的暗算，连夜搭车赶回长沙，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上午四点钟左右到了湘潭，遇到办事处的同志，知道周副主席已到湘潭，我才放心。赶到下司驿，副主席正准备到衡山去，一见我来了，就问我什么时候赶到的，我说走了两天两夜，刚才到。他一听我没有睡觉，就连忙把我带到附近一间房子里，将睡在床上的吴坚同志叫起来，要我躺下休息，并且说：“我今天到衡山去，你先睡一觉，明天赶到衡阳。”

周副主席渡过河，发现办事处还有一部分人和物资未过来，他就在渡口停下来，等待人员和物资，办理善后事宜。副主席对同志和人民的财富是极为关心、负责的，在那种危

急情况下，他总要等同志们和所有的物资走完了，他才动身。

由渡口到村子里去的一条路很小，汽车开不进去，只好停在公路旁。次日拂晓准备走了，到公路上一看，汽车不见了。大家很着急，就分散去找，当时天还不大亮，过往的人多又杂，查不出是谁偷的。这时副主席发现我也在找汽车，他就说：“你怎么也起来了！快回去睡觉，汽车丢不掉的。”找了好久，终未找到，司机气得直跺脚，副主席安慰他：“不要急，车子不会丢的。”副主席早已料到，这是国民党特务搞的鬼，故意把汽车开跑了。

汽车没有找到，副主席只好乘办事处的救护车到衡山去。一路上都是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三五一群，灰溜溜的走着，一支枪象千斤重担似的，把背都压弯了。这些溃不成军的军队，从长沙一直拉到衡阳。

以后，我们到了衡阳，找到了周副主席的小汽车，原来是白崇禧的部队（辎重团）在南岳偷着用大卡车拖到衡阳附近来了。我们派人去要，国民党部队不给，后来由白崇禧写了一封信，才把汽车要了回来。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海外的爱国华侨，听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英勇抗击日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捐献运动，献出了很多钱，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物资支援抗日。这些器材都是先从香港运到蒋管区，然后再转到解放区和抗日前线。在长沙撤退时，这些物资都由我们办事处人员带着走，一直带到衡阳，堆放在市郊公路上。

在湘潭下司驿休息不久，我就按照副主席的指示赶到衡阳去了。在衡阳市郊公路上，遇到我们办事处看管物资的同志，我一见他们，就跳下车问副主席住在那里。他们说还在

衡山，并说他快要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就坐在公路旁边等起来。

下午四点钟左右，一辆救护车穿过人群向前驶来，我认出那是我们的救护车，就跑着迎过去。

副主席一跳下车，看到公路两边堆满着器材，转过脸来就问我：“东西为什么堆在这里，不疏散隐蔽起来？”我说：

“我不知道，我刚才来到。”他严厉地说：“你怎么刚到？你不是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一下车就管，你为什么不管？”我一听脸立即通红了，再没有说的。副主席立即召集在场的同志分头找地方，很快就把物资疏散隐蔽好了。副主席也和大家一起搬运，弄得满身是汗。

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大，现在想起来还那么深刻。副主席一下车就发现器材堆在公路上，很容易遭到敌机轰炸，可是我就没有想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副主席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利益的高度负责精神。

曾 家 岩

1938年12月间，周副主席经衡阳、桂林到了重庆，这是一座古老、雄伟的山城，杨子江、嘉陵江在它脚下滚滚流着。

重庆，早就是国民党的陪都了。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就躲来这座“天府之国”的山城。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祸秧子移植到那里，哪里的危运就开始了。重庆自成为陪都那天起，就开始了巨变：贪官奸商象蝗虫似地飞来，加上敌机

凌空狂炸逼得许多平民无论酷暑凛寒只好露宿街头；失业人数激增，物价飞涨，街头巷尾经常横倒着饿死的人。同时，这里遍地特务、满街狼犬，更使这座秀丽的城市，笼罩着血腥恐怖。

副主席到了重庆，住在曾家岩一座小楼里，办公也在这儿，当时被称为“周公馆”。不过，这座“周公馆”的里外环境是经过国民党当局苦心安排的。小楼座落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公馆侧面的一条胡同里，马路直修到戴笠公馆的门口，副主席上下汽车都得徒步走过一段狭窄的胡同；小胡同的两侧，还有三四家茶馆和几个烟摊子，这些都是戴笠布下的“坐勤”。公馆的小楼是三层。我们住一、三层，第二层由另外两家用：一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一家是国民党银行的工作人员。这些“员”也都是戴笠安下的“内勤”。传达室只有一半是我们的，另一半住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更绝的是，在去防空洞与厕所的路上也住着一家特务。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副主席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副主席的衣食住行，随时都受到特务甚至戴笠本人的严密监视，就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还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哩。

与副主席到重庆的同时，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也扩充了人员，并由机坊街搬到红岩咀。红岩咀位于嘉陵江畔，是座孤零零的山。起初山上只有我们办事处一幢三层楼，倒相当清静幽雅。可是不久，国民党便把国民参政会迁来了。同时修建起许多高楼小舍，暗设下许多特务据点，把办事处重重包围起来，办事处所有人员都受到监视。所以当时许多同志都愤慨地称这里是“文明监狱”。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立即遭到国内外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严厉地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乱命”，并把新四军编建为七个师；全国人民纷纷集会游行，痛愤声讨；国外华侨也喊出了正义的呼声。但是，当时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对这阴云密布、前途艰危的时局，忧虑深沉，思想混乱。皖南事变后，有些民主人士悲观失望地说：“完了，国共合作算完了！”有些社会名流则痛心地说：“中国要亡了！”还有些人则公开叫喊要“共产党放下武装”，“不要另起炉灶”等等。我们少数不大懂策略的同志，对蒋介石的毒辣手段，更是深恶痛绝，无法忍抑胸中怒火，一致要求：“跟他干！”“先打了再讲！”

在那些日子里，副主席整天地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他走访国民党元老，反复地同各民主党派接触，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扶持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给民主党派指出方向，巩固统一战线；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何应钦等亲日派的阴谋，狠狠打击了投降派的凶焰，使蒋介石顽固派不敢轻易扩大内战，不敢轻易投降日寇。

皖南事变后，特务们更加疯狂了。在曾家岩“周公馆”的前前后后安下了五十多个专职特务。我们每个人外出，总有两个特务盯梢；副主席的汽车一开动，特务的汽车马上就跟上了。但是一切监视、盯梢都不能束缚我们，副主席照旧积极地活动着。我们曾和特务作过许多巧妙的斗争，捉迷藏是经常的事。记得有一次副主席要会见一位朋友，我们就事先请这位朋友将汽车开到两路口公园旁边的一条僻静的公路上等着。象每次一样，我们的汽车开动了，特务的汽车也就